

我们的

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
重庆市文艺工作团

回忆录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队史研究会
重庆市文艺工作团团史研究会

我们的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
重庆市文艺工作团

回忆录②

主 编 阎 彬

副主编 李之杰 曹明舒

孙士平 胡 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队史研究会
重庆市文艺工作团团史研究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
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

重庆市文艺工作团



责任编辑 李之杰
装帧设计 薛 菲





通讯员——演员

□ 阎 彬

我出身在工人家庭，父亲很早去世，母亲把我们姐弟四人抚养长大。1948年南京二姐与她几位同事结为姐妹。某日他们突然从国民党演剧队消失了。我曾到她们工作的地方找过，有人悄悄告诉我，你二姐和阿鑫她们已经逃走了。因为特务要抓她们。不久特务找到我家要打听她们的去向，而妈妈反向特务要人，特务在我家坐等了一天，晚上特务灰溜溜地撤走了。从此我们和二姐、阿鑫她们就失去了联系。阿鑫（陈岚）曾在上海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中很红，又指挥过上海大学生万人大合唱，而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她只好转移到南京。在国民党演剧队和二姐以演戏为掩护。后因地下党被破坏，二姐她们又转移到上海郊区以乡村学校教书为掩护。可她们竟敢在学校教学生唱解放区歌曲，教扭秧歌，又引起当地特务怀疑，组织上安排阿鑫去了苏北解放区，二姐转到上海别的乡镇以教书为职业隐蔽下来。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我已初中毕业，等待升高中，当时南京为庆祝解放，锣鼓、秧歌一片欢乐气氛，又掀起了青年学生参军热潮。

我当时也没心思升高中求学了，一心想参加革命队伍。不过当时我十五岁还不够格呢。我与同学去二野军大报名处，我隐瞒了年纪报了名。回家向妈妈商量，但妈妈坚决不允许。我知道父亲去世早，二姐又不知去向。在妈妈身边只有我这么个么儿，她怎么能放心呢？

1949年7月下旬南京炎热的夏日，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来到我家。进门就喊了一声妈。我和妈妈都愣住了，此人是谁？她猜到我们认不出她了，就说了一句：“我是阿鑫。”这下我们才认出来这是常来我家的欧阳鑫。过去她是一对长辫子，学生打扮，如今剪成了男孩短发，一身黄军装，束个腰皮带，简直像个男的。她的到来给妈妈带来了喜讯。她告诉我们当时在南京因特务要抓她们就和文娟转移到上海乡下。后来组织安排她去了苏北解放区。文娟（我二姐）继续留在乡下教书。她这次带来二姐亲手写给我们的一封信。陈岚的到来给我带来了参军希望，我向她提出参加西南服务团的要求，她高兴地说“好呀”，妈妈最后也同意了。我知道在阿鑫姐身边妈妈是放心的。第二天我就随陈岚到新街口，原国民党财政部办公楼（文艺大队所在地）。文书老郭当了我的考试官。

他叫我看一本《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书，并要求看完后谈感想。此书我大概看了一遍，我回答说：“文艺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嘛。……”这就算过关了。郭文书分配我当田副大队长的通讯员，当时发给我一套黄军装，穿上挺神气的。不过衣服大了点，陈岚拉着我到附近照相馆二人照了一张合影。她说给妈妈寄去，老人家也就更放心了。

听说田大队长是文艺大队首长，分配我和他住一个房间。天一亮集合上操哨音已响，我赶紧起床，穿上军装就跑。等上完操回到宿舍，我发现怎么起床掀过的被子已经叠得整整齐齐，洗脸水也打好了。晚自习时郭文书叫我到办公室。我一进门郭文书就对我大吼：“小鬼，你搞颠倒了，要首长当你的通讯员吗？乱弹琴！”当时我还有理地说：“我也没叫他给我叠被子，打洗脸水。再说了新社会不是讲人人平等，官兵一致吗？”当时他气得拍桌子，后来才听说田大队长批评了郭文书，说对大城市学生兵不能简单粗暴，要慢慢诱导；不要像对待老区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我原以为担任通讯员只打打水，传达个命令而已。我参加革命是为了当文艺兵，又不是当勤务兵的。我还满肚子委屈呢！之后和田队长相处的日子里他教我打绑腿，一边给我讲为人民服务的道理：革命队伍的通讯兵很重要，只是分工不同嘛。这位首长是抗日时期打过鬼子的老干部。年龄比我大一倍还多。他经常给我讲在敌后时打鬼子的故事，我觉得他真像个老大哥，慈祥地对我这个小老弟。他没有一点官架子。不久经队部研究决定，把我和厉重民（李教导员的通讯员）下放到分队去学习，就不在队部了。我被调到音乐分队三小队。分队长是表姐陈岚，她叫我跟她学指挥，可我连五线谱都不认识，之后又叫我和赵发魁一起学习拉二胡。我对音乐简谱勉强认识，在音乐队中滥竽充数。

文艺大队在南京政训学习，三个月快到了。田大队长就告诉我，他要调到川东支队准备参加重庆区县接管工作，要分别了，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位尊敬的老大哥，我与田老相处时间虽不长，但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他在万县工作时，我经常去看他。他是1936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待遇仍是抗日干部待遇。为此事我在重庆还曾去市老干局反映过他的待遇问题。后来有次去万县才知道组织上给他改正级别，定为老红军，副省级待遇，田老已经去世几年了。至今我还保存着他送给我的一副垂钓的高级鱼竿。他知道我喜欢钓鱼。

南京集训三个月期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我们离开南京向大西南进军。我们跟随刘、邓大军踏上硝烟弥漫的征途，历时三个月，徒步行军七千里。跨越七省、三渡长江、横渡洞庭湖。沿途走崇山峻岭，气候寒冷，山高路险，随时会遭遇国民党散兵游勇和匪徒袭击的危险，我跟随大哥哥、大姐姐长途跋涉，我的脚板由水泡变

成了血泡，不敢掉队，怕发生危险，当时年龄小，从没离开过大城市，从没离开过妈妈，从没出过远门，更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艰险路程。通过军旅生活和艰苦行军，这对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最终没有趴下，我挺过来了。

1949年12月27日，文艺大队到达重庆，奉重庆市委决定，成立重庆市委文工团，并立即深入街道、学校、工矿、农村为群众演出。文工团员必须要“一专、三会、八能”，我参加过大合唱、集体舞、扭秧歌、打腰鼓、打连宵、演小戏、装台、拆台、搬运布景、道具、灯光、服装，见什么干什么，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每天背起背包就出发，有的乡镇有“万年台”，挂上两盏气灯就演出。有时一天演三场，饿了啃个馒头、吃碗小面就行；困了就在台上打开背包睡觉，毫无怨言。因为观众很爱看人民当家作主、建设新中国的节目。有的农民从来没看过话剧，习惯于“开场锣鼓”响完才开演的看戏方式，我们在台上演话剧，他们以为我们是在摆“龙门阵”，认为戏还没开始，甚至出现上台跟演员借火点燃自己的叶子烟的笑话。第二次再去那里演话剧的时候，农民爱看话剧了。我把能为观众演出作为了自己的神圣天职。

我入伍前，在南京读书时曾看过《棠棣之花》、《雷雨》、《升官图》、《野玫瑰》等话剧，感到话剧比戏曲更明白易懂，便爱上了话剧。我在舞蹈队时，话剧队经常借我参加，话剧《保尔·柯察金》、《伏契克》的演出。1954年又要我参加喜剧《幸福》，饰演邓忠良一角，演出后获得观众好评，领导发现了自己的话剧表演潜质，是个好苗子，团领导决定把我从舞蹈队调出，正式转入话剧队。我暗自庆幸，我的愿望实现了，说实话，我参加革命的动机就是为了当上话剧演员。因为服从组织，所以听从领导的安排，叫干啥就干啥，如今我正式转入话剧队，今后我要努力塑造刻画角色，当好一个演员。当时，看到话剧队里的大批艺术骨干，都是功底扎实的话剧艺术家，今后我可以随时向亦师亦友的大哥大姐们请教，学习他们丰富的话剧经验。

剧团还为青年演员开办演员表训班，请教授陈卓犹讲表演理论课，又由徐九虎系统传授她从中央戏剧学院导训班苏联专家列期里那里学到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基本理论和演戏技巧，对引我“入门”话剧大有裨益；我们的剧场——抗建堂，曾是抗战戏剧的主要阵地，上演过许许多多脍炙人口的好戏，创造了中国话剧的黄金时代。我能在重庆当一名话剧演员，能在抗建堂演戏，感到无比自豪。卯足劲“干中学、学中干”积极深入生活。为了演好工人、农民、战士、知识分子，数次在“重钢”、“二钢”、“南岸皮鞋厂”体验生活。我开过“地滚”、练过钢，学做过皮鞋，数次去农村开荒、种地、收割麦子、抗旱浇水。又数次去部队同战士同吃、同住、同训练。为了写医院的戏我曾入市一工医院上过手术台，当过主刀医生的第三助手。因为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演员必须多方面接触生活，观察各阶层各行业的人和事，将这些人 and 事的感情认识，作为创造角色的积累和储备。只有不断学习，提高理论文化修养，在实践中探索积累创造角色的经验。我先后演过古今中外话剧50多个角色（多数是配角），当时部分青年演员中，感到没有更多演出实践机会而苦恼，在青年人闲谈中，大家议论不如组织一个青年演出队，可演一些小戏，到农村、工厂演出，可以解决青年演员存在的实践问题。在这批青年中我是一个党员，就向党组织反映青年人的想法。结果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我差点被打成“右派”，认为我们是脱离党的领导，分裂革命队伍。在党内我做了违心的检讨总算过了关。但有的同志就被划成“内控右派”罚下农村改造。我曾参加过一些演出，从演群

众到演配角、主角。如《比翼高飞》中的胡万林，此剧1966年曾进入怀仁堂为中央领导演出，后又去全国巡回演出。《死环》（吕班）、《以生命的名义》（波里斯）、《霓虹灯下的哨兵》（童珂男）、《朝天门》（王副市长）、《苦水甘泉》（林大川）、《北京人》（曾霆）、《万水千山》（罗营长）等角色。之后，开始演重头角色，接连在《转折》、《西安事变》、《虎穴英华》、《陪都新闻》四个戏中扮演周恩来。

使我难忘的一个戏是我团创作排练的《针锋相对》。我演团政委洪杰，是从上党前线调到重庆《新华日报》，以记者身份，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剧中侧面反映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和指挥上党战役，两个战场同时展现。政委洪杰是剧中的重要人物，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把上党与重庆二个战场结合起来，体现毛主席的“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主体思想。剧团创作演出的《针锋相对》本身就是同“四人帮”斗争中诞生成长的，而“四人帮”及其亲信罗织种种罪名，横加迫害，帮派头目曾写了十多封黑信，向黑主子告密和献媚，疯狂扼杀《针锋相对》，忘图搞垮军队和四川省委，打倒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并下令封杀此剧勒令停演。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才挽救了《针锋相对》，使此剧获得了新生。

“文革”时期，邓小平上台整顿领导班子，我和张展同志作为掺沙子进入到话剧团革委会领导班子，不过这期间谈不上排戏演戏了，整天闹革命、抓批判。我和张展被造反派定为是文艺黑线培养的人物。当然也少不了批判。终于熬到“四人帮”倒台，“文革”结束，文艺的春天来临，迎来了话剧的繁荣。团里同时排两个戏，一天演出二至三场。演出的实践多了，但我又产生新的渴望。希望能系统地学习充实自己，市委任书记也曾说过“话剧是培养艺术家的，而不是培养干部的”。当时话剧团的工作千头万绪，历史遗留问题太多，如“反右”及“文革”落实政策问题、工资问题、住房等问题。我真不想当团里的领导，恰逢“中戏”来渝招生，我偷偷跑去报了名，参加了考试，竟然被“中戏”录取了。我只好向文化局领导汇报，得到的答复是“不能去，丢下剧团自己到北京学习，剧团怎么办？”受到局老领导的批评，作为一名党员，只有服从大局，而放弃了绝好的学习机会，还是要安下心，老老实实从事剧团的领导工作。

1967年我团排演话剧《转折》是“文革”后，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形象第一次出现在话剧舞台上，市委领导十分重视，钱敏书记亲自选定扮演周恩来的演员，从四位候选人化妆造型相片中，由钱敏拍板决定。第二天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庆昇在全团大会上传达市委钱敏书记的决定，由我来演周恩来，并指出全团上下、集中力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我一方面为能有机会塑造敬爱的周总理舞台形象而激动，另一面我感到压力大（毕竟我过去大多是演的小字辈），剧中周恩来的戏不多，但分量重，导演要求必须首先达到“形似”，要得到观众认可。要做到“形似”首先要从脸部造型入手。老团长李庆昇亲自写信给北京的周来（延安鲁艺干部），我到北京得到中国话剧团领导周来的全力支持，派最好的化妆师（专给王铁成化妆的）用高超化妆技术，终于得到周来及“中话”王铁成等演员们的认可，返渝后又得到重庆美院、电影公司、博物馆、重庆乳胶厂等单位的无偿支援和帮助。使我塑造领袖人物信心倍增，而后潜心研读剧本反复琢磨台词，聆听总理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讲话录音，一遍又一遍看有关资料及有关总理的纪录电影。最后才进入排练阶段，排练中对每句台词、每个眼神、步态身姿反复排练一丝不苟。

在演出《转折》时，周恩来只在台上出现十多分钟，竟出乎意料地取得全场观众十一次热烈掌声。更使我久久难忘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同志，戏完走上舞台，紧紧地抱着我失声痛哭，我清醒地意识到人民是多么热爱周总理。演出效果如此强烈，我认为主要是人民对总理思念太深，自己的角色创作还是很肤浅，我暗下决心尽最大努力，突破“形似”争取达到“神形兼备”的周恩来舞台艺术形象。后在《西安事变》、《虎穴英华》两剧中又扮演周恩来，在表演上有所进步，不停留在“形似”上，观众的审美要求也不断提高，原南方局老同志童小鹏，语重心长地袒露心迹：“有些同志老感觉我们不太满意舞台、屏幕上的周恩来形象，其实，我们比任何人，更热切地盼望看到真正好的周公形象啊！”老一辈的期望，促使我必须继续努力。

重庆自己创作的大型话剧《陪都新闻》绝对主角是周恩来。这对我面临更大的考验。该剧写的是重庆谈判，蒋介石发动内战加紧部署，进步民主人士力劝毛主席尽早返回延安，极其敏锐的时刻，发生了李少石（周恩来秘书，长相酷似周恩来）乘坐周恩来的轿车，被国民党军人枪杀了这一事件。“一枪震动山城”。社会舆论（包括国民党内部）一致认为是“蓄意谋杀”。周恩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并要求查明真相，严惩凶手，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立即冷静地进行深入调查，发觉“事有蹊跷”（如子弹穿过汽车尾部后座打死李少石，为什么轿车被擦伤？并有不属于李少石的血迹？为什么出事后司机悄然离去？目击证人吞吞吐吐……）精细过人的周恩来亲自向目击证人、卖老荫茶的老人耐心说服，打消顾虑，老人最后说出事情真相。谋杀事件终于真相大白。少石之死并非“谋杀”，而是误杀，并非“政治阴谋”，而属偶然事件。周恩来经过激烈的内心斗争，克制住满腔悲愤，以共产党人的原则实事求是地处理“李少石事件”，亲自到医院慰问并向被撞伤的士兵道歉，负担治疗一切费用，从刑场救下开枪肇事的国民党班长（因他有过该罚，但罪不当诛），又向宋庆龄通报情况，表示原则立场，强忍悲痛劝说胜于手足的少石遗孀廖梦醒相忍为国，接受张治中送来的中华民国国旗的善意，并将旗子盖到少石遗体上。并在《新华日报》以钱之光名义发表李少石事件真相，公开澄清事实，展示周恩来坚持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无私无畏，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无产阶级领袖的博大胸怀。

在塑造角色时，我想到郭老对总理的评语“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泄地，处理问题的办法如闪电行空”。对我处理这段戏很有启发。周恩来角色，靠化妆像不像，方言足不足，体态准不准，是无法完成塑造周恩来角色任务的。邓颖超大姐在我们排演过程中来渝视察时说：“我们共产党人靠真理、靠实事求是吃饭。李少石事件就是典型事例。”邓大姐的话给了我一把通向塑造周恩来丰富内心世界的钥匙，但使我感受最深的是通过以往的生活亲身回忆。在1956年我和周总理曾有过零距离接触，那年周总理和贺老总，参加万隆会议回国来重庆视察休息时，我和五位青年演员参加在大坪红楼为总理举行的舞会。周总理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兴致很高，请服务员拿来茅台酒和每人碰杯欢饮，大家向总理敬酒，他来者不拒，当我们向贺老总敬酒时，周总理接过酒杯，对大家说：“贺老总血压高，不能喝酒，我代他喝吧。”说罢一饮而尽，总理对老战友的深情和爱护，使我极为感动。当我们邀请总理欢看话剧团正在演出的话剧《日出》时，总理爽快答应。周总理分两次到抗建堂看完《日出》，还和我们开会座谈，开始会场显得拘谨、紧张，总理一下坐到桌子上，会场顿时活跃起来，周总理对团长李庆昇说：“重庆话剧团演出很

多，你带头实行剧团自负盈亏，为政府节约开支，怎么样？你敢，我们就击个掌。”李庆昇笑而不答，始终没敢伸手击掌。接着，总理亲切地问了几位导演的家庭出身情况时，第一个导演回答是地主，第二个回答也是地主，第三个回答还是地主，此时全场哄堂大笑，总理急忙亲切坦诚地以自己出身大家庭为例，说家庭出身不是自己能选择的，身不由己，但不妨碍忠诚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民族立功。

红楼第二天舞会上，周总理请每位女同志跳舞，当舞会宣布结束时，他突然发现没有和其中的一位女同志跳过舞，就要求乐队再奏一曲，和这位女同志跳完舞，才释然离去……。这些事似乎很平凡琐碎，但都让我接触到周总理的内心，他心里想的是人民，关心人，尊重人，也使我们更容易体会他老人家说的共产党最重感情这句话的深刻含意。每当我扮演周恩来时，这些珍贵的亲身经历，就像电影般的在脑海里浮现，给我源头活水的创作灵感。这也说明演员创作“心象”首先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生活的观察与生活的库存。

在《虎穴英华》剧中周恩来与金曼娜谈论抗战戏剧的一段戏时，我就回忆四次与总理接触的情景，体现出周恩来的幽默、潇洒、知识渊博、对话剧表演还是行家。这段戏的处理得到观众好评。在《陪都新闻》中周恩来处理李少石事件的同场戏，我又回忆，当年总理在重庆红楼舞会上，谈到万隆会议国民党特务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国民党特务以为飞机上有周恩来，在飞机上放置了炸弹，使参加会议的杜宏等同志全部牺牲。杜宏是原重庆市委秘书长）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总理对同志的热爱和对敌人的愤恨。在《陪》剧中，“李少石事件”在周恩来了解事情真相后，内心极度悲痛，留下了激动的眼泪。我通过自己过去的激情记忆，唤起同角色在规定情景中类似的感情和激情，有助于我体验舞台上周恩来的形象塑造。演员必须遵循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话剧《陪都新闻》参加了首届重庆雾季艺术节演出，全国著名戏剧家云集山城。这个戏得到老领导任白戈和张颖、张瑞芳等艺术家的肯定和鼓励。北京人艺的于是之、夏淳激动地到后台祝贺，拉着我的手说：“舞台上的‘周恩来’，正是他们心中的周总理。”话剧大师曹禺对我谆谆点评，他对我说：“这个戏很好，这个戏的导演、演员对领袖人物的塑造，首先考虑周恩来是人，不是神，这个起点和创作思路是对的……”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鞭策。

离休后仍怀念演员的生活，我曾参加近 20 多部电视剧的拍摄，扮演过大小不同类型的屏幕人物形象。如《仇比情深》的董事长，《朝天门》的王市长、《西陵峡之谜》的船政委、《海之魂，山之子》的纪委书记、《新华军》和《百团大战》的何应钦、《中国之命运》的张东荪、《解放大西南》的国民党政客；喜剧《太太反击战》的保安队长；电影《李之凡太太》的经理、《悲情丽人》的老工人等。特别是在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中，我扮演的胡教授很有意思。此电视剧已经播出十多年了。在重庆甚至我到昆明、深圳、成都等地旅游，有人碰到我就叫“胡教授你好”，其实这些人我并不认识，有几次我购物太重提不动，请“棒棒”帮我提回家，但东西送到家后，他不收钱，并说：“胡教授资助我们棒棒娃，又帮助他考上大学，你是个大好人。”我怎么说就是不收钱，还说：“我们也帮助一下胡教授嘛。”其实胡教授在剧中并不是主角，但我认为做为演员，表演艺术的灵魂就是要真实、鲜明、动之以情地体现人物的“真善美”，观众就不会忘记你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这些话让我很感动，真没想到剧中人物若干年后还在群众心目中植下

根，念念不忘。

2003年我又被重庆电视台邀请担任“红叶红”栏目主持人，工作了两年多，与电视台主持人李媛媛搭档一老一少，主持老年人为内容的栏目，受到中老年人的喜爱，我又结识不少中老年新朋友。特别感到兴奋的是，电视台组织十多名各栏目主持人（包括我在内）赴涪陵、万州、永川、市中区与观众见面，我感到电视艺术影响力是巨大的。每到一地人山人海，找主持人签名，观众提出各种问题。在黔江与观众见面时，我遇到有八位退休老人找到我，他们是黔江区电影公司的退休职工，他们已经有八个月没有领到退休金了，请我帮忙在“红叶红”栏目中，反映他们的实际困难。我即时把此事向台里有关领导汇报，但答复是“不能报导，现在社会上，下岗、失业、领不到工资的情况太多了，如果开了这个头，以后电视台麻烦就大了”。后来老人们又来到我们住的宾馆一再央求我帮忙，不然他们要到市里上访、静坐。当时我只能向老人们表态，我回重庆一定向有关单位反映你们的问题。希望你们不要到重庆上访了，我寻思八位老人，四十多年来把青春都贡献给电影发行放映事业的退休老人，已到了举家食粥待赈地步，为什么向各级政府反映他们的困难都得不到解决，如泥牛入海呢，我也是老人，八个月没有拿到养老金，这是很难想象的。电视台活动结束后，我们从黔江回到重庆之后，我以个人名义，向市文化局、市电影公司、市老龄委等单位反映此事，但得到的答复基本上一致。“关于老人退休金的问题还是要黔江有关单位自己解决”。我又数次给黔江有关单位打电话也是无济于事。后来我想到一个好朋友是市某局领导，他的学生就是黔江县的书记，我费尽口舌向他介绍八位老人的困境，央求他一定要说服县领导解决老人们的退休金，这位老友总算还有同情心，答应给黔江县书记做工作。我还冒了一次险，打了一个擦边球，在第一期电视“红叶红”栏目中，在谈到老年人生活时，我在报导中说“一个单位八位老人有八个月未拿到退休金，这些老人自谋出路，摆地摊、卖早点、借债维持生活”。没想到这档节目播出后影响很大，我想这一下可能被电视台要清退了，好在台里没有对我兴师问罪。经过一个多月各种渠道、方方面面疏通做工作，终于迎来了黔江老人们的来信，告诉我大好消息，他们八人的养老金、八个月的工资全补发了。领导还拨了一间临街门面，供老人们可以做些小买卖，解决老人们以后的生活问题。他们信中对我一再表示感谢。我能为老人们做一些事，我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老人们今后可以安度晚年了，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回忆半个多世纪我的斑斓岁月，从一个不懂事的少年，从当通讯员开始，也曾学过指挥，练过二胡，参加歌唱跳舞，最后才定位在话剧岗位上，这完全是革命团体的培养，战友们的帮助，加上自己努力才能成为一名专业话剧演员。这个革命团体还培养锻炼我成为一名基层（话剧团和演出公司）领导干部，培养我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这辈子虽没有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更谈不上什么人生辉煌，但我牢记邓政委在南京对西南服务团同志的教导：“要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做事。”我这大半辈子就这样老老实实地走过来了，庆幸的是我选择这条人生道路是正确的，是很有价值的。60多年没有白过。我觉得自己一生中活得很踏实也很满足。晚年也实现了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也祝愿老战友们晚年幸福、健康长寿、永远欢乐。

2012年3月15日



话剧生涯 60 年

□ 孙 轲

重庆市话剧团自建立到今年，已经走过一个甲子，我的话剧表演生涯也度过了 60 个春秋，往事历历在目，特别是初次登上舞台的情景，还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改变了我的入生轨迹。重庆解放后不久，我所在的原二十一兵工厂宁和中学，与本厂技工学校及其他几个兵工厂的子弟中学合并，成为以培养工业战线技术人员为目标的西南工业部工业学校。当时我一心想的是努力学习，当工程师，但是临近毕业的一个通知改变了一切。说是团区委负责同志找我去谈话，这使我大吃一惊。我想：“我没犯什么错吧？团区委的人为什么找我去谈话呢？”我忐忑不安地跨进了团区委的大门。原来是团区委动员我去参加正在招收文艺兵的重庆市文工团。其原因是团组织了解我在上学时就会吹笛子，解放后又积极地参加了跳秧歌舞的活动。出身好，政治可靠，就这样，我怀着既好奇又惶恐的心情，响应团组织的号召报名参加了重庆市文工团。从此，我的人生进入了一个求知的新领域。

我被分配到文工团的军乐队，这个队是在接收国民党原“总统府”的一支军乐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正处于人员青黄不接的时期，一些年纪较大的老队员已经离队，需要补充新人，在新队员入队的仪式上军乐队的领导给每一位新成员配发“战斗武器”，新成员一个一个地上台从领导人手里接过各式各样的我还叫不出名字的乐器，有的是小号，有的是萨克斯，同伴们领到这些乐器时，个个兴奋地立即擦拭起来，把心爱的乐器擦得

光亮。临到我上台时，分配给我的是一管大喇叭，足有我一半身材那么高，很粗的铜管绕了一两个大圈，喇叭口比我的肚腹还大。这让我一下傻了眼，眼前立即浮现出每当民间办红白喜事或商店开业时，那些穿着白色衣服，戴着白色手套的，大吹大擂招摇过市的身影。我想，这不是要我去当那种下九流的吹鼓手吗？那多没出息呀！心里一下子凉了半截，顿时闹起了情绪，想立即离队回校读书。文工团领导知道我的情况时，就对我说，“你可以走。”我提出转回青年团组织关系的问题时，领导表示不同意。我想，这不就是把我当逃兵看待开除我的团籍了吗？那怎么行呢？要是这样回到我的班上，又怎么对我的同学们交代呢？领导的这一招真的把我给吓坏了，于是，我留在文工团了。

第一次演出，导演把我推上舞台

过了一段时间，文工团领导把我调到演员队，从事话剧表演。当时我对话剧是一无所知，领导对我们进行了一年多的培训，除了学习普通话外，主要是学习苏联戏剧艺术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团里的几位导演轮流给我们上表演课，给我们做示范表演。我们沿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边学习边实践，逐渐懂得了怎样进行舞台演出。

1952年重庆市话剧团上演话剧《保尔·柯察金》，分配给我饰演一个德国兵的角色，这是我第一次登上话剧舞台。临上场前，我真是又紧张又恐惧，浑身出冷汗，手脚都在发抖，脑子里一片空白，该我上场了，徐九虎导演在我身后一把将我推到台上，我不由自主端着一把上了刺刀的真枪做道具，冲到舞台边，差一点将刺刀刺在饰演朱赫来的田广才身上，我的唯一一句话的三个字台词“不许动！”也不知道是怎么说出来的。大幕落下了，我出了一身冷汗还傻乎乎地站在台上……这就是我的舞台表演生涯的开端，有了这第一次以后，第二次、第三次就不再害怕了。

父亲看话剧气得拂袖而去

我当了话剧演员后，曾发生过一次很有意思的家庭风波。我父亲是兵工厂的老工人，曾看过厂里露天剧场演出的京剧和电影，但是到剧场看话剧却是前所未有的。有一次他来话剧团看我，正赶上剧团上演曹禺的名剧《雷雨》，我让他过去看了这场戏。回家后他对邻居说话剧很好看，一家人在24小时内差不多都死完了，只剩下了几个老人。不久后，他又到团里来，还带来了一位同事，说是想看戏。我就为他们买了票，这次上演的是一出名为《达尼娅》的外国剧目（由陈丽娟、徐立起饰演男女主角），戏中有青年男女主角相拥接吻的情节，两位老工人看到这场戏后，很不高兴，认为大庭广众之下这些行为有伤风雅，气得拂袖而去，提前退出剧场。等我抽空从舞台大屏幕缝隙处张望父亲的座位时，那两个位子已经空了，父亲还为这事让我回家一趟。他一见到我就不耐烦地说：“原来你们就演出这些名堂呀！你是不是也演过这种戏？”看来老爷子真是生气了，很难向他把事情说清楚，于是就解释说，那是外国戏，才有那些内容。由于我演不好这种戏，团里也没有让我演过，这场家庭风波才算平息下来。此后，他再也不来看话剧了。

与京剧、越剧、川剧等具有百年以上的悠久历史的传统戏剧相比，话剧运动从1910年任光、汪中贤和欧阳予倩等在上海建立“进化团”这个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算起，即使到了20世纪50年代，话剧在中国的戏剧舞台上，也只有40多年的历史，还是一个

比较新的年轻的剧种。父亲的反应表明，直到那时，话剧还远远没有普及到中国工农劳动大众中间去。

自登上话剧舞台以后到1959年仅10年的时间，除了《保尔·柯察金》，我还参加了《四十年的愿望》、《尤利斯·伏契克》、《幸福》、《西望长安》、《在那一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天国春秋》、《刘介梅》、《无名英雄》、《把一切献给党》、《红色风暴》、《花儿朵朵》、《决裂》、《烈火红心》等多种题材和多种艺术风格剧目的演出，使我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为我的舞台生涯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当然，我是从小角色演起，逐渐饰演了戏中分量比较重的角色。其实，舞台上的角色不分大小，都需要演员认真对待，尽心尽力，我自知没有受过戏剧表演的专业教育，又不是科班出身，每次演出心理压力是很大的，除了在领导安排的专业培训中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外，只有兢兢业业，依靠自学来充实自己。我当时加紧补课，按九虎导演说的，反反复复地学了斯坦尼的《我的艺术生活》、《演员自我修养》等著作，同时注意向经验丰富的老演员领教受益。这样边实践边学习，所饰演的角色也能给观众留下一点印象。在演戏的同时，我也参加了影片《嘉陵江边》的拍摄，当然，在表演上也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总的来说，作为一名刚出道的青年演员，在这段时间内我的成长还是很顺利的。

刚走出人生低谷，又陷入事业困境

从政治上讲，我出生于产业工人家庭，又是革命烈士后代，可说是根红苗正，父亲是兵工厂的钳工，解放后不久又加入了共产党。爷爷孙津川，11岁时就因家境贫穷，在南京洋炮局当了童工，出师后去上海，先后在几个机器厂当工人，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军进驻上海前参加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沪宁、沪杭两铁路罢工委员会主任委员，铁路工人纠察队大队长，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他虽未出席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却被选为中共六大监察委员会委员。这年7月，由于叛徒出卖，孙津川被捕入狱，10月6日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时年才33岁。爷爷牺牲后，我母亲安排好身后事，才将噩耗告知曾祖母。照说我家是烈士的后代，可万万没想到在20世纪50年代连绵不绝的政治运动中，政治上的厄运竟然也降临到我的头上。1959年我家面临一场大祸，我的母亲这样一个没有文化和社会阅历的、一个工人家里的家庭妇女，都成了“现行反革命”，其原因就是她和当地的户籍员发生矛盾和纠纷，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入狱劳改，直到1964年才得以平反。母亲遭受莫名冤屈的那几年，在文艺战线上工作的我自然受到牵连，不但轮不到我演戏，就连住家也不得不从重庆市话剧团迁出去，那段时间，我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日子很不好过，我心里真是痛苦不堪。

母亲被平反后，我又被起用了，不仅可以登台演戏，而且还分配我担任了戏码较重的角色，例如《年青的一代》的男主角肖继业、《红岩》的陈松林、《甜蜜事业》的唐二叔、《降龙伏虎》的贺国忠、《幸福》的周传豪等等。离开舞台五年了，我对获得的演出机会非常珍惜，尽心尽力演好所担任的这些身份、性格有较大差异的角色，仿佛感觉到观众对我的演出也还满意。这段时间，我参加电影《烈火中永生》的拍摄，当时我已有了两个孩子，我当了爸爸，一儿一女，我感到自己已经走出前段时间那可怕的人生低谷，心情很舒畅。

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艺界成了这场浩劫的重灾区，不仅在全国范围内中断了各种正常的文艺活动，连许多文艺界的精英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也没完没了地遭批斗、关牛棚，甚至入炼狱，遭受灭顶之灾。重庆市话剧团也几乎整整十年停止了演出活动，幸运的是我没有在这次“文革”中遭受到政治上的冲击，相反还受到“青睐”，被吸收到了所谓的“专案组”，这个组自然是是非之地，我曾经有过被整的切肤之痛，所以抱定了决不整人害人的宗旨，对人对事一概实事求是，无私公正，决不加油添醋，更不无中生有，所以至今我都问心无愧。当时最大的苦恼就是长期不排戏，不演戏。好在重庆市话剧团还在招收新学员，这使我感到将来还是有希望的。

“戏比天大”，演好戏先做好人

1961年开始，我就有白血球偏低的毛病，经常在三院打点滴，主要是补充能量合剂，白血球一直在2000~3000左右，医生开的病休也没休息过，一是演出任务忙，二是不想错过每个参加演出的机会。

我记得好像是1989年演出《白莲花传奇》，有一天在演出中间，我下场后去厕所方便，就晕倒在厕所内，团内有个青年演员小韩，半拖半扶地将我从厕所内扶出来，休息了一会儿，该我上场了，我强提精神把戏演完；我老伴从家里赶到剧场，带我去三院看急诊，在医院打针服药搞了很久，医生又开了病休证明，因为还有演出任务，不可能休息放弃演出，每天演出前先推一针50%的葡萄糖，再演戏，这样一直坚持到《白莲花传奇》告一段落。我是一个演员，有责任和义务坚持工作，这也是对观众，对工作，对文艺事业的负责精神，我要珍惜每个角色，每个演出机会。一个演员应该学习戏剧大师常香玉说的“戏比天大”，要想演好戏必须要先学会做人。

我演了一次坏人

我从艺几十年，都是演工农兵，很少演坏人。记得1989年拍了一个电视剧，叫《乱世红颜》。不知怎么，导演让我去演一个日本军官松野，其中有一段戏是松野对一个中国妇女实施强暴，我实在演不好，本身我特反感这种戏，现在让我去演这类情节，怎么办？我就和导演商量，强暴过程不要太细，点到为止，只要让观众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了，没必要在屏幕上出现扭打撕衣的镜头。其实我们的观众都很聪明，对这类戏很敏感，很痛恨也很反感，但不少戏中还是出现扭打撕衣等镜头。导演认同了我的想法，我才能很好地完成了松野这个角色。

沐浴在文艺的春光里

“文革”结束后，随着科技界春天的到来，文艺界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被禁锢了10年的观众对“文革”后话剧团演出的剧目爆发了很高的热情。曾经出现过看话剧一票难求的现象。对我们演员来说，焕发出了艺术生命的活力，除了在剧场演出外，还深入到基层群众中演出。记得当时演出的《针锋相对》是在红旗剧场（现在的抗建堂），基本上是场场爆满；话剧《丹心谱》上演后轰动一时，我在这些戏里都担当了较重的角色。可惜的是，我花了很大工夫参与排演的《假如我是真的》这出很受观众期待的话剧没能与

观众见面，相信这个对“文革”有深入批评，具有很强时代气息的戏如果演出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响。

20 世纪 80 年代初，电视业异军突起，各地方电视台步中央电视台后尘，开始拍摄了一些探索性电视剧，我有幸赶上了这股戏剧新潮流，参加了一些电视剧的拍摄，使我的表演生活有了个从舞台到荧屏的新的拓展空间。20 多年来，我参加了一些电视剧的拍摄，担任的角色有大有小，剧中戏的分量有轻有重。我之所以参与拍摄电视剧，一是受朋友的邀请，同时也是因为在电视逐渐普及而话剧演出相对不景气的情况下，可以使我的演出生活得到充实和延续。我退休以后，更是如此。可以说参加电视剧的演出，延长了我的演艺生涯。计算起来，我退休后的 20 多年演的戏，比在职时的 40 多年还要多点。在重庆电视台拍摄的《中学生变奏曲》中我饰演该剧男主角的父亲黄父。有一位朋友送给我一份《大众电视》杂志，我这才知道在 1988 年举办的第六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时，我曾获得了该奖项“最佳男配角”的提名。我非常感谢这位朋友对我的关怀，让我得知这一令人高兴的讯息。在《山城棒棒军》这部电视剧中（重庆电视台拍摄），我饰演“三大伯”这个角色，只有几场戏，可还是给观众留下了印象。2001 年我在美国探亲时，曾在纽约唐人街的一个超市里遇到一位万州老乡，他对我说：“我认识你。”可我不认识他，表示很诧异。他解释说，我看过《山城棒棒军》，你演“三大伯”是吧？原来是在异国他乡遇见知音了。在《傻儿师长》这个电视剧中，我演一个剃头匠，也只有几个镜头。主要剧情是：我给傻儿师长剃头，却被他“讹”了一把，他叫我连眉毛一起剃掉，我照办了，他却反过来怪罪于我，我有口难辩，不但没得到剃头费，反而倒贴他一块钱。这个搞笑的情节当然逗乐了观众。事后我回忆起来，也有点回味无穷的感觉。从艺几十年，只有改革开放这 30 多年来，文艺界在不停顿地发展，演艺界真是百花齐放、春色满园。虽然自己退休了，也还是为文艺界繁荣而庆幸，也为自己走到街上还能被观众认出来而感到欣慰。

从艺几十年，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深入社会，到工农兵、群众中间去体验生活，表现各种人物性格，尽职尽责地演好戏，让观众满意。回想起来，大半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话剧事业，我感到非常荣幸。

平平淡淡才是真

要说我这一生的经历，其实非常简单，出了校门就进了话剧团，退休后还在拿退休金。

我父母生育 6 个儿女，“文化大革命”中夭折一个小妹，家中负担重，我是老大，从参加工作那天起就帮着父母养家糊口，供弟妹上学。我和老伴结婚 53 年了，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美国一家通信卫星公司上班，儿媳在美国搞白内障、青光眼的药物研究，有两个孙子，老大 13 岁上高一，老二 9 岁上初一，女儿在重庆市骨科医院当医生，女婿在商业部门工作，外孙俩在读清华大学美院学雕塑专业，今年毕业。顺便说说我儿女乳名的来历。1959 年，搬出话剧团后我和妻子住在红旗剧场票房楼上，父亲来看我们时说，生女儿取名小红，生儿子取名小旗，两个孩子名字连起来就是红旗，正好是我们“红旗剧场”的名字。（这个剧场是抗战时期建的，当时叫“抗建堂”，意思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是当时全国人民的愿望。解放后，改为“红旗剧场”。）给孩子的取名表现了父亲